

《群书治要》善治思想的当代借鉴

程冠军



《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一部治世典籍，更是一部善治宝典。这部唐太宗的“枕边书”开启了大唐的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四次辉煌盛世，并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远播海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返本开新，《群书治要》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我们研究《群书治要》的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助推当代中国走向善治。

《群书治要》中的善治思想

《群书治要》贵在一个“治”字，仅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大禹治水、皋陶执法，还是老子的上善若水，我们都可以从中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道”。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治理的典范。禹的父亲鲧治水采取堵的办法，结果白费心力，导致洪水泛滥。禹治水采取的是疏导的办法，结果使洪水这个“猛兽”被彻底驯服，不仅不再危害人类，反而能够造福人类。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治国之要：堵为下策，疏为上策。

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鼻祖。皋陶拥有一只司法的守护神——獬豸，獬豸是一只独角神羊。皋陶每当执法判案遇到困难，是非善恶难以区分时，就求助于这只神羊，神羊识别善恶之后，就会用羊角奋勇顶向犯罪者。那么，为什么它是羊而不是狮子或牛呢？因为皋陶是柔性执法，狮子是猛兽，牛为大型动物，羊则温良而不失勇敢正义，羊顶其一角则是一种惩戒，并不危及生命，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戒，也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质上是一种“善法”理念。

孟子所倡导的善教与皋陶的“善

法”理念是一致的。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并强调善政和善教。他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如果老百姓违法犯罪，不是老百姓的错，而是当政者的错。理由是，老百姓之所以违法犯罪，是当政者没有教育好他。怎么办呢？这就是实行善教。只有实行善教，才能导正民心，匡正社会风气，从而实现善政，进而达到善治。

首次正式提出善治的是老子。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把善的美德总结为“七善”，并且提出了善治。由此可见，善治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

古今中外看善治

中国古代就有了善治的理念和追求，但善治的实现还需具备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德治，二是法治，三是现代化，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德善同理，我

们的祖先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善治文化体系，比较集中的体现就是这部《群书治要》。但是仅有德治是不够的，还要有良好的法治，中国古代虽然也重视法治建设，但历代帝王所制定的法律都离不开“家天下”的影子，极少有良法。另外，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现代化的条件，也就永远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试想，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美好生活，何谈善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现代化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实现善治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拥有现代化的条件，有的也拥有良好的法治，但是缺乏良好的德治体系，尤其是他们所奉行的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其发展理念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甚至为了少数人利益、本民族利益、本国利益，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毫无爱与善，更谈不上大爱和大善。试问：没有爱与善，何来善治？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思想家的理想。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行“仁爱”思想，却不受欢迎，因为列国之君不愿意接受他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四处碰壁，原因在于古代君王没有民本自觉。与中国古代政治和西方政治具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拥有“民本”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实事”“以人民为中心”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到今天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后，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善治社会，未来可期。

当代中国正走向善治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借鉴儒家思想中的小康理念，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目标。这表明，我们党的现代化目标传承了“大同”和“小康”的文化基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鲜明地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一词首次写进中央文件，正是对中华善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科学的制度化安排，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目标。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中国共产党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善治思想，又赋予善治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之治，目标在善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善治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善治的路线图也越来越清晰。当然，善治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需要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从《群书治要》这部善治宝典以及其他优秀文化典籍中汲取更多的治国理政智慧，为善治中国提供更为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

（作者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全国《群书治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

家训 品鉴⑦



《海学说》： 玉不琢，不成器

王杰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读书勤奋，才华横溢，笔耕不辍，文学上造诣极高。《海学说》就是他在茫茫史籍中，结合自身的经验，留给他的次子欧阳奕的精神财富。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欧阳修其人。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籍贯江西庐陵（即今天的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他的一生先后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官，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为人正直，注意选拔后进，曾支持范仲淹的革新运动，到了晚年思想趋向保守，后来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死后谥号“文忠”，所以一般也称之为欧阳文忠。

欧阳修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他是宋代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发展了韩愈的古文，引领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基于他正确的古文理论而开创了北宋新一代文风，他创作的散文成就很高。同时，他还变革了诗风和词风。他和宋祁合撰《新唐书》，编撰了《新五代史》，说明他有较高的史学成就。现在传世的有《欧阳文忠集》。

那么，欧阳修《海学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受到怎样的启示呢？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这段文字出自《欧阳修全集·笔记》，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

玉石如果不雕琢，就不能成为器物；人如果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然而玉石作为一种物质，拥有不能改变的恒常品质，即使不雕琢为器物，也仍然不损害它作为玉的本性。人的品性，会随着外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人如果不学习，就会放弃成为君子而变为小人，怎么能不思考这个道理呢？这就是为父对你（欧阳奕）说的话。

在欧阳修4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庭很贫困，但是他的母亲对教育很严格。为了节省开支，欧阳修的母亲以芦苇、木炭作笔，在地上教欧阳修写字，这就是“画荻教子”的故事。他的母亲经常以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教育他，在母亲的影响下，欧阳修在家训中也表达要儿子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从而达到做人做事的道理。这篇《海学说》就是他教育二儿子欧阳奕时写下的，鼓励他儿子努力学习、提升道德修养。《海学说》的目的就在于此。

欧阳修在《海学说》中讨论了“玉”与“人”辩证关系。他想表达的意思是，玉石如不经过雕琢与打磨，就不能展现光芒被人喜爱。人如果不能静下心来、不经过锻炼，就不能成为拥有高尚品德的君子或有所作为。当今社会，物质发达、欲望泛滥，假如人们再不努力学习，就会碌碌无为、失去精神方向，更找不到幸福和快乐。所以，《海学说》中的警句名言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反省自己，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和灰尘擦去，恢复我们内心本来的纯净面目。我们努力学习读书，勤奋奋斗就是为了拥有更幸福和更有意义的人生。面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很容易就会走上邪路歪路。欧阳修在《海学说》告诫儿子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走正道，这对欧阳奕为官做人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海学说》中指出“人之性，因物则迁”。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熟悉的《三字经》中说道：

“昔孟母，择邻处。”在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为了教育好孟轲，先后三次搬家，就是为了给孟子寻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最后安家在学堂附近，这样孟子就能够常常亲近仁者，在老师与同学的氛围中成长，得到良好的熏陶。最终孟子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为一代儒家圣贤。所以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做人做事同样如此，亲近仁者，就会变善；亲近恶人，就会学坏，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如同贴着朱砂会变红，挨着墨汁会变黑一样。荀子也说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他的意思是：蓬草生长在麻丛中，不须扶持自然就会长得挺直；白沙混进黑泥里，就会变得和黑泥一样黑。所以，这就是“环境造就人”的意思。因此，父母家庭的言传身教显得弥足珍贵，孩子的行为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长辈有很多不良嗜好，都会深深影响到孩子，例如抽烟、喝酒、赌博等等。所以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

此外，欧阳修还善于识别人才和培养人才。他曾举荐过的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历史证明确实都是人才，后来都受到了朝廷重视。而且，欧阳修所引领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旨在传承和发扬古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的人格与文学成就相得益彰，在他们后面都能看到欧阳修的教诲与影响。因此，欧阳修宽广的胸襟，对人才的鉴别与培养，对文学革新事业的贡献，让后人切实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

《海学说》中提到的玉有不变恒常的属性，但是人的心性会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生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没有勤奋努力好学的习惯，很有可能远离道业，由君子变为小人，不可不谨慎小心。再者，人的一生，若是没有学习的目标、方向、习惯，难免会有迷茫和无助，缺少了学习的信仰，更会不知所措、遗憾虚空。

通过学习欧阳修的《海学说》，我们对“玉”与“人”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中的名言，“玉不琢，不成器”可谓是海学良言，发人深省，引人向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主要思想解读嘉宾】



艺文 丛谈

人类命运挑战中的“省”与“思”

——读《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有感

马惠娣

2020年伊始，一场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较量正在进行中，至今在全球已有超过1亿人口被感染，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与其他战场不同，人类这个“对手”需要依靠1000倍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它的“尊荣”，那是带着“王冠”的、“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新物种，人类命运正被挑战。

不少国内外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反思，尽管见仁见智，但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人类过于野心膨胀，而傲视地球上的一切存在物。法国哲学家蒂格洛说：“这场在几周之内使世界陷入瘫痪的流行病，清楚地暴露出当前的‘发展模式’异乎寻常又令人震惊的弱点……疫情证明，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已被判了死刑，而被一同判了死刑的还有人类。”

去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一书，作者丹溪草在疫情大流行中“静心反思，静心理稿，静心观察外部世界，静心观照自己的灵魂”。透过人类命运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这一线索，照见了人类的孱弱与渺小。

作者借助对多段人类历史变迁的考证，对比各种文明遗存，探究历史疑惑，

勘察人类命运轨迹，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金钱、人与物欲的各种关系，感知人类命运在当代的生存危机，以及未来的各种不确定。书中的历史线索关涉古今中外，纵横交错，需大量史料与文献以佐证。这展现了作者史学与哲学背景固有的功力及驾驭全局的能力，亦使整部书的谋篇布局呈现阔达之势。

书内有六个章节，分别是：“社会动物”“部落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资本文明”“理想秩序追梦”，呼唤人类突破历史和认知的局限，意识到人类文明的属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呼唤人类应以史为鉴，尊重自然、尊重本真、尊重传承。

作者告诉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人性最终会告诉我们，人生最悲哀和痛苦的莫过于无聊和孤独。”可是当下，人类整体陷入“孤独”，这让人类的情绪变得暴躁不安、失去自我、判断力下降、思维能力减弱等等，而人类整体在分裂与撕裂。

作者将人类命运与“规则”联系在一起，并以儒家的儒雅对“规则”做了诠释：克己和温柔是快乐、幸福的纽带，人与人

之间一切关系，无论爱情、友情、亲情，还是物质生活追求简约、低碳排放的生活方式，精神生活追求艺术、快乐、独立，与自然平等交流，都是既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应抛弃那种一方面把所有的社会基本服务视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把不承担社会基本责任也视为理所当然的虚幻梦想。尊重自然法则，遵守人类规则，虽然大多数规则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然而，不管是否承认，它们早已潜入我们人类的生命，流淌在血液里，敬天爱人、守规克己、秩序井然。温柔是人类所有美德的基础和综合，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无论自然天理规则，还是人情约定规则，或者是人文强制性规则，都可以融化于内心平衡。

中华民族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既是规矩，成就“礼仪之邦”，也让规矩成为可能。

“没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之于个体、群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至关重要。在作者看来，最大的“规则”当属对自然的敬畏与谦卑。“这是人类进化中接近规律的真实。如果人类真想远离灾祸，就得在21世纪做出正确的选择。”面对2020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倘若没有反思，灾难将成为人类彻底的悲剧。”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也许在此。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正式出版

5月20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衢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衢州学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孔氏南宗文献丛书》新书发布暨南孔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衢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刘章华致辞，本书主编、衢州学院教授吴锡标介绍了图书整理情况，本书责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大项目编辑室张慧霞介绍图书出版情况，4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由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编纂，共48册，收录孔氏南宗族人的著述41种，记载孔氏南宗的

书的封面有两句话是对主题的映照：认识自己的渺小，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儿时奶奶常叮嘱：宽慢来，弗着急。看得出作者性情中的谦逊与恬淡，以及静中生慧的能力。不由得让我想起《大学》开篇之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静、安、虑、得，大概也是人类认知行为中的真理。

作者原名朱红，他告诉我，他是1000年前金华名医朱丹溪族群的后裔，自己从小长在丹溪河边，高寿百岁的奶奶常说“宽慢来，弗着急”，对他的品性影响很大。取笔名“丹溪草”，既是对先祖与家乡的敬慕，也是让自己像“草儿”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与朱红接触不多，但是他的文人情怀和士人之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透过这本《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我看到了作为个体应有的情怀与格局，欣赏了成熟者思想品行的魅力。我对他说：“你做了非专业人士的专业著述；探索了非学者的历史变迁路径，十分难得。”

（作者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著述2种，是继明代衢州知府沈杰整理汇编《三衢孔氏家庙志》之后，对孔氏南宗文献研究的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出版。

孔氏南宗著述是孔子世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孔氏南宗文献散佚情况相当严重，现存资料又极其分散，从而严重制约了孔氏南宗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鉴于此，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于2016年开始，对孔氏南宗文献进行了系统搜集与整理汇编。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孔氏南宗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编纂出版，一方面具有抢救性保存古籍的作用，一方面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用，不仅厘清了孔氏南宗内在的发展脉络和机制，将推动孔氏南宗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对江南学术的梳理、浙学的研究、宗族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且将为之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构筑了孔氏南宗研究的新高地。（张丽）

文化 信息

《中国文化要素体系》专家评议会举行

日前，《中国文化要素体系》专家评议会在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功举行。会议由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服务价值与文化传播评估理论与技术》项目之子课题《中国文化要素体系及文化附加值评估研究》承担单位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主办，1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评议会。

本课题主要内容是面向中国文化重点应用领域复杂场景的多元化设计需求，构建符合当代多元化设计需求的中国文化知识库、素材库，开发文化附加值数据分析及素材重构交互设计软件，实现中国文化要素化和价值增值，提升中国文化设计与创作效率和感染力。《中国文化要素体系》作为课题的主体责任之

一，是整个项目的底层工作。基于海量古籍文献的整理分析，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技术手段，创造性地提出了六分法体系架构，系统地构建了中国文化的表层、中层、深层三重结构，使每个具象的文化要素实现纵横两个方向的高度概括，既涵盖了中国文化要素的历史成因，又体现出中国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搭建出一个全新的中国文化要素框架模型。

评议专家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观看了模型演示，并与课题组进行了深度交流，对《中国文化要素体系》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该成果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科技含量高，指出该课题的价值在于如何利用当代的计算机技术，有效指导中国文化要素在文创产品、工业、建筑设计等场景的实践应用，提升创作效率。作为该课题的底层或基础性